

摘要

中国父母历来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传统的父母教育也比较“严格”和“专制”，随着中国开放生育政策，二胎出生的压力容易让父母产生差别对待、专制教养等教养方式。有研究表明，父母专制教养不仅影响孩子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影响他们的同胞关系，而学业成绩的高低往往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有关。国内外关于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三者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

本研究以在完整家庭中有同胞的3到6年级的中高年级小学生为被试，以同胞关系为中介变量，研究父母专制教养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采用的《父母专制教养问卷》、《同胞关系问卷》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问卷均有良好的信效度。

研究结果显示：（1）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专制教养的程度普遍偏低。（2）小学生的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年级和同胞性别组合上存在显著差异；（3）同胞关系在同胞年龄差上存在显著差异，父母专制教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胞年龄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4）父母专制教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5）父母专制教养和同胞关系能显著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6）同胞关系在父母专制教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教育建议：对于家长来说，应该避免专制教养，合理选择教养方式；妥善处理同胞冲突，引导积极同胞关系；主动关心孩子学习，积极配合家校共育。从学校方面来看，学校应该注重学生的差异性，关注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重视家庭教育，共建家校合作；开设相关培训课程，助力家长教育。

关键词：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

目 录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1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2 文献综述	3
2.1 父母专制教养	3
2.2 同胞关系	6
2.3 学业自我效能感	8
2.4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11
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11
3 核心概念界定	13
3.1 父母专制教养	13
3.2 同胞关系	13
3.3 学业自我效能感	13
4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15
4.1 研究目的	15
4.2 研究思路	15
4.3 研究假设	15
5 研究方法	16
5.1 研究对象	16
5.2 研究工具	16
5.3 数据处理与分析	17
6 研究结果	18

6.1 父母专制教养的现状	18
6.2 同胞关系的现状	20
6.3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状	24
6.4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27
6.5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	28
6.6 同胞关系在父母专制教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29
7 讨论	31
7.1 父母专制教养的总体特点	31
7.2 同胞关系的总体特点	32
7.3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总体特点	33
7.4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34
7.5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	34
7.6 同胞关系在父母专制教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35
8 结论与教育建议	37
8.1 研究结论	37
8.2 教育建议	37
参考文献	42
附 录	50
致 谢	i
关于学位论文原创性和使用授权声明	ii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iii

Abstract

Chinese parents hav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raditional parenting in China is considered "strict" and "authoritarian". With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birth policy, the pressure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may also lead parents to adopt inappropriate parenting methods such as differential treatment and contro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not only affec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but also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often related to academic self-efficacy. There is almost no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study took 3rd to 6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have siblings in a complete family as participant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through sibling relationships as a mediator variable. The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and Dimension Questionnaire," "Sibling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and all questionnaires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In families with a second child, the degree of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is generally low.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erms of gender, grade, and sibling gender combination.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ibling relationships at the sibling age gap,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at the sibling age difference. (4)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s are als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self-efficacy. (5)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6) Sibling relationships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or parents, they should avoi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choose reasonable parenting methods; properly handle sibling conflicts, guide positive sibling relationships; actively care about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schools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school's perspective, schoo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focus on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value family education, 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open relevant training courses to assist parents in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ibling relationships; Academic self-efficacy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虽然国家为减轻儿童学业负担，推出了“双减”政策，但依旧无法打消家长们“内卷”的热情。从“幼小衔接”到“中考分流”，家长们时刻关注着学生们学业成绩的变化。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成绩受到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直接影响，Bandura（1978）将学业自我效能感比作是学生学业成绩的“预警器”，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越得心应手，越能胜任学业任务，他们在面临困难时，更愿意采用积极的行为去解决问题（Zimmerman, 1995），容易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Komarraju, & Nadler, 2013; MacPhee, Farr, & Canetto, 2013）；相反，学业自我效能感比较低的学生，在面对学习任务时，常常感觉无力，学业成绩也欠佳（沈俊娟，2016）。事实证明，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表现、学业成就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仅受学校和老师的影响，还受到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当孩子年龄还比较小的时候，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仁格日乐，2012）。

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传统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都与西方不同，这也就造成了父母教养与西方有极大的不同（王丽等，2005）。研究表明，中国的父母比北美的父母更有可能在亲子互动中使用身体胁迫和言语敌意（Leung, Lau, & Lam, 1998）；父母高压、控制、专制的教养方式对同胞关系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Lougheed, & Hollenstein, 2012; 陈玉珠，2013）。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独生子女”家庭演变成“二孩”家庭，甚至“多孩”家庭。同胞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夫妻婚姻质量短暂下降（Krieg, 2007），影响彼此在子女教养方面的相互支持，容易出现不当的教养方式。有些父母为了转移婚姻冲突的焦点，让子女成为不和谐婚姻关系的“替罪羊”，表现出苛责和拒绝的教养方式（Eral, & Burman, 1995）。此外，中国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父母在二胎的教养上缺乏经验和借鉴，头胎可能会因为二胎的出现感到失落，觉得二胎的出生抢走了父母的关注和资源（Rohde et al., 2003），从而对二胎持消极和不接纳的态度，使得同胞关系和亲子关系朝消极方向发展。此外，同胞的出现也可能影响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董颖红，刘丹，2019），有研究表明，经常发生冲突的同胞更容易产生内外化的问题行为，学业表现较差，自我价值感也较低（Buist, Deković, & Prinzie, 2013; Buist, Vermande, 2013）。

当前国内外关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家庭。在国外，一些学者研究了同胞的性别和同胞年龄差异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但没有涉

及同胞关系（Gutiérrez, 2017）。在中国，多子女家庭中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专制教养和同胞关系对小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拓展学业自我效能感和二胎社会性发展的相关研究领域，帮助父母认识同胞关系在儿童学业中所起的作用，重视父母教养的重要性。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目前，对于多子女家庭中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研究还比较匮乏，本研究不仅考察了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专制教养的情况和其对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还考察了同胞关系对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及其在父母专制教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作用，并建立理论模型，以期研究结果能为多子女家庭的父母教养提供理论参考，帮助家长选择更合适的教养方式，提高父母教养水平。

1.2.2 实践意义

本研究有助于帮助多子女家庭父母正确认识专制教养对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及同胞关系在其中的重要性。帮助父母缓解教养压力，培养积极亲密的同胞关系；促进父母在在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提升上与教师搭配，实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父母专制教养

2.1.1 影响父母专制教养的因素

父母专制教养是父母教养 (parenting style) 的其中一个分类。比较早期的学者认为, 父母教养是父母在亲子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情绪和行为, 或者是父母在教育 and 抚养子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倾向 (Baumrind, 1971)。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是否使用专制教养,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父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儿童的性别和气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经济因素等。

2.1.1.1 父母自身的因素

从父母自身的角度来看, 父母的年龄、文化程度、对孩子的看法等都可能是父母采用专制教养的原因。Relva 等人 (2019) 在葡萄牙对 190 个家庭的青少年和父母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父亲通常比母亲更严格地管教子女。那仁格日乐 (2012) 对比了 20 到 29 岁年龄组和 30 到 39 岁年龄组的父母教养发现, 年龄组偏低的父母更容易采取专制教养; 与自主性较强的父母相比, 从众倾向较强的父母表现出更多的专制控制 (Luster, Rhoades, & Haas, 1989); 相对于文化程度高的父母, 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倾向于采用专制教养; 大学文化程度的父母专制性较低, 小学和中学文化程度的父母专制性较高 (那仁格日乐, 2012)。同时, 当父母对孩子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时, 比如认为孩子是冲动的和有缺陷的, 则更多的采用专制教养, 以便更好的控制和监管孩子 (Sigel, 1992)。

2.1.1.2 儿童的因素

儿童不同的年龄、性别、气质特征等也是影响父母专制教养的因素。在青少年同胞中, 年龄较小的同胞更容易受到高程度的惩罚管教 (Relva et al., 2019)。从同胞性别来看,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 父母对女生更容易采用放任教养, 男生则更容易采用专制教养, 在多子女家庭中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 (Carvalho, Fernandes, & Relva, 2018)。儿童自身的特质也是影响父母教养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表明, 儿童的情绪和专制教养呈正相关, 儿童的情绪越波动, 越难以控制, 父母越容易采用吼叫等专制教养方式 (Porter et al., 2005); 儿童困难的气质与父母批评性的、敌意的教养或者较少的父母温暖有关 (Kendler, Sham, & MacLean, 1997), 儿童越难相处, 父母越容易采用拒绝教养 (Neitzel, & Stright, 2004)。当然, 也有研究表明幼儿的比较难相处的气质与父母的教养方式之间没有相关性 (Lemery, & Goldsmith 2002)。

2.1.1.3 家庭系统的影响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从溢出假说(spillover perspective)的角度来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将反应在子女教养上(Engfer, 1988; Erel, & Burman, 1995)。

首先，Erel 和 Burman (1995) 使用元分析发现，父母之间的冲突与多种形式的不良教养呈显著相关。婚姻冲突可以正向预测父母的专制教养 (Krishnakumar, & Buehler, 2000)，对婚姻不满意的父母，往往容易发生冲突，父母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们对孩子的需求缺乏容忍度，削弱了父母双方的教养能力 (王明珠等, 2015)，无法做到共同养育，容易出现控制、拒绝、惩罚等不恰当的教养方式；有的父母甚至与孩子建立联盟，排挤其他家庭成员 (Jenkins, Rasbash, & O'Connor, 2003)。其次，家庭关系不和谐的父母，更容易聚焦孩子的问题行为，将愤怒发泄在孩子身上，以转移婚姻关系中的冲突和压力，孩子成为父母婚姻不和谐的“替罪羊”，受到更多的控制和严厉对待 (Erel, & Burman, 1995)。也有人从补偿假说(compensatory perspective)的角度出发，认为父母为了弥补婚姻不和谐带来的心理缺失，会将更多温暖的情感投入到子女的成长中，以寻求情感上的满足 (Engfer, 1988)，在教养上便不容易出现专制等行为。

从亲子关系来看，如果父母与子女无法进行有效沟通，将会导致亲子关系变差，进一步削弱父母的教养能力。有研究显示，如果沟通能力较差的父母觉得其他管教方法对子女无效时，他们更有可能使用言语或身体攻击来寻求孩子的服从 (Roberto, Carlyle, McClure, 2006)。同时，家长与幼儿公然发生冲突的频率越高，父母就越容易采用专制教养 (王明珠等, 2015; 陈斌斌, 施泽艺, 2017)。

2.1.1.4 社会经济因素

那仁格日乐 (2012) 的研究表明，相较于农村父母，城市父母更多采用民主的教养方式。这可能是因为与农村父母相比，城市父母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和教育知识有关，农村父母往往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更容易采用溺爱和专制的教养方式。

除了以上因素，父母专制教养还受到文化环境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相比台湾母亲，美国母亲更少采用专制教养 (Yu, & Gamble, 2008)，中国大陆的父母比北美父母更有可能在亲子互动中使用身体胁迫和言语敌意 (Leung, Lau, & Lam, 1998)，汉族父母比蒙古族父母更容易采用专制教养 (那仁格日乐, 2012)。

2.1.2 父母专制教养对儿童的影响

虽然，父母对儿童的专制教养出发点往往是好的，但是却容易出现父母意想不

到的效果。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拒绝、专制等消极教养行为，都与子女的多种内外化问题呈正相关（Steinberg et al., 1994）。

首先，父母专制教养可能会限制幼儿自我意识的发展，有研究表明，父母专制教养与儿童的负面情绪状态（如压力、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Felson, & Russo, 1988; Porter et al., 2005）；其次，父母专制教养还容易造成幼儿同伴关系不良，使得幼儿更有侵犯性、独立性差、不遵守社会规则等特征（Yu, & Gamble, 2008; 那仁格日乐, 2012）；同时，父母对幼儿过于严厉，容易导致亲子关系紧张，专制教养下的儿童很难从紧张和缺乏温暖的亲子关系中体验到合作与沟通的乐趣，长大之后容易缺乏社会责任感，反而更难达到父母所期望的教育效果（那仁格日乐, 2012）。

2.1.3 父母专制教养的测量

目前，国内外没有专门针对父母专制教养方式的测量工具，一般都是将专制教养作为父母教养的一个维度，通过测量教养方式来研究专制教养。

岳冬梅等人于 1993 年修订了 Perris 等人（1980）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该量表比较全面、细致地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分类，并且信效度较高，被广泛使用。量表分为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其中，父亲教养方式的分量表包含了“情感温暖和理解”、“严厉惩罚”、“过分干涉”等六个维度；母亲教养方式则包含了“情感温暖和理解”、“拒绝否认”等五个维度，量表总共 66 个问题。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 0.81 和 0.83，总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5，说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蒋奖等人（2010）修订了简易版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修订后的问卷保留了原来的三个核心维度，由 21 道题目组成，父亲版和母亲版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杨丽珠和杨春卿（1998）编制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该问卷共包含五个维度，包括溺爱型、民主型、放任型、专制型和不一致型，共 40 个项目，由家长填写。该问卷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14（那仁格日乐, 2012），显示其信效度较高。该问卷不仅考虑了父母的专制和过分干涉的问题，还考虑了父母的溺爱和放任的问题，能够比较全面地评价父母的教养方式。

Melby 和 Conger (2001)开发的父母教养问卷，包含 11 个条目，从监控、说理和严厉三个方面来评价父母的教养行为，分为积极教养和消极教养两个维度。其中，监控和说理属于积极教养，严厉属于消极教养。该问卷信效度良好，适用于青少年。国内的研究者也曾使用此问卷，但使用方式略有不同，吴莹婷等人（2017）让青少年填写，而李剑侠等人（2012）则要求家长填写。

Peixia Wu 等人（2002）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ing Practices Questionnaire, PPQ）更适用于中国文化，在中国被广泛使用。问卷包含权威、专制和宽容教养三个维度，学者比较常使用的是权威和专制这两个维度（Wu et al., 2002, 王明珠等, 2015）。问卷采用 5 点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4。

2.2 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是人一生中经历最长和最持久的关系（Portner, & Riggs, 2016），从同胞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彼此会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特别是年幼的同胞，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多（Sanders, 2004），同胞关系在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1 同胞关系的分类

同胞关系根据不同的方法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同胞关系可以根据同胞的成长经历、基因、家庭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四个方面进行分类，通常可分为全同胞(biological siblings)、半同胞(half-siblings)、继亲同胞(step-siblings)、收养同胞(adoptive siblings)和寄养同胞(foster siblings) (Cicirelli, 1995; Elgar & Head, 1999)。全同胞指的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半同胞指的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继亲同胞和收养同胞则指的是通过通婚或收养而形成的同胞关系，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基因，但却拥有部分共同的家庭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而寄养同胞则指的是无任何血缘关系和共同法律地位的同胞 (Elgar & Head, 1999)。

根据同胞之间的互动，一般将其分为同胞温暖和同胞冲突两个维度（Buhrmester, & Furman, 1990; Brody, 1998）。同胞温暖包括亲密、感情、支持、陪伴等积极方面，而同胞冲突则包括争论、争吵、打架、侵略、敌意、消极和胁迫等消极方面（Sanders, 2004）。根据 Furman 等人（1985）对 198 名五、六年级儿童进行的《同胞关系问卷》调查分析，同胞关系可从四种成分进行划分，包括亲密、冲突、竞争和权利对比。大部分同胞关系同时存在温暖和冲突两个方面（Noller, 2005），总体来说，幼儿的同胞亲密关系普遍高于同胞冲突（陈斌斌, 施泽艺, 2017）。

从心理功能角度来看，Padilla-Walke 等人（2010）将同胞关系划分为积极同胞关系和消极同胞关系两个维度，积极同胞关系主要是同胞温暖和同胞亲密；消极同胞关系主要为同胞冲突和同胞竞争等（赵凤青, 俞国良, 2017）。

2.2.2 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2.2.2.1 儿童自身因素

同胞关系受到性别、年龄和气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就性别而言，不同性别对同胞关系的感受性有所不同。女性更容易在同胞关系中感受到亲密，而男性则更容易感受到冲突。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在幼儿中，同胞的性别与同胞关系几乎没有相关，特别是在入学后，同胞的性别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微乎其微（Abramovitch et al., 1986; Martin, & Ross, 2005）。

就年龄而言，同胞关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同胞之间的冲突和亲密程度可能会减少，到达一定年龄阶段后会趋于稳定（Buhrmesterm, & Furman, 199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同胞之间的亲密程度呈倒 U 型，即先上升后下降（Kim et al., 2006）。

此外，气质困难可能与消极的同胞关系有关(Lemery, & Goldsmith, 2002)。气质比较困难、适应性不佳的儿童，往往更难接受同胞的出生(Legg, Sherick, & Wadland, 1974)，当感受到父母对同胞的区别对待时，他可能会嫉妒同胞，出现一些问题行为(Hart, & More, 2013)，影响同胞关系的发展。

2.2.2.2 同胞的结构特征

同胞关系的结构特征包括同胞的年龄间隔和性别构成等，已有研究证明，这些结构特征会对同胞关系产生影响。

同胞间的年龄间隔直接影响每个同胞的角色、同胞间的互动以及二人的相对权力，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同胞关系（Newman, 1996）。然而，关于年龄间隔对幼儿同胞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并不一致（Dunn, & McGuire, 1992），有研究表明，在 7 到 8 岁的孩子中，如果同胞之间的年龄间隔小，则容易发生比较和竞争，有较高的冲突频率（Minnett, Vandell, & Santrock, 1983），而 Abramovitch 等人（1986）的研究则证明年龄间隔不会影响学龄前儿童之间的同胞关系。

同胞的性别组合主要分为同性组合和异性组合两个大类。有研究表明，同性组合的同胞比异性组合的同胞有更多的冲突（Felson, & Russo, 1988; Vespo, Pederson, & Hay, 1995）。在童年期，兄弟组合更容易发生冲突，姐妹组合更容易发生嫉妒和竞争行为，异性同胞组合或者是姐弟组合的同胞关系相对其他组合而言更亲密，在成年期，姐妹组合的同胞比其他组合的同胞更能获得彼此的支持（Buist, Deković, & Prinzie, 2013）。

2.2.2.3 家庭系统的相互影响

家庭系统中的各个元素及各个系统（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Cox, & Paley, 2003）。研究表明，婚姻关系中，父母幸福感不高、经常发生家庭冲突、家庭凝聚力差等因素都与消极的同胞关系有关（Brody,

Stoneman, & Burke, 1987)；父母温暖、合作的婚姻关系与温暖、融洽的同胞关系显着相关 (Yu, & Gamble, 2008)。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同胞关系不会因为目击了父母的愤怒和争吵而变得更差，反而有一些年长的同胞会通过增加对弟弟妹妹的照顾来回应父母的愤怒 (Jenkins, Smith, & Graham, 1989)。

如果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比较温暖，相处融洽，那么孩子的同胞关系往往也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反之，同胞关系往往比较消极 (Eriksen, & Jensen, 2006; Hoffman et al., 2005)。同时，从父母对两胎的态度来看，父母与头胎的关系越好，对二胎越接纳，同胞关系就越亲密，反之，则容易发生冲突 (McHale et al., 2007)。

综上，儿童的性别、气质、亲子关系、父母的婚姻关系等都是影响同胞关系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同胞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同胞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都会产生变化。同胞相处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冲突，年长的同胞会在弟弟妹妹出生的前三年与之争夺母亲的爱 (Yu, & Gamble, 2008)。到了儿童中晚期，直至青少年期，同胞之间的亲密度和冲突性都会因为孩子与家庭意外以外的人(如拥有更多的同伴)的交流增加而降低，这时，同胞关系居于支配地位 (赵凤青、俞国良, 2017)。

2.2.3 同胞关系的测量

比较广泛采用的同胞关系测量问卷有：李燕等人 (2019) 编制的儿童早期同胞关系问卷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问卷包含同胞温暖、同胞冲突、同胞嫉妒三个维度，共 18 题，用于测量 0 到 8 岁儿童的同胞关系，父母填写，5 点计分，问卷信效度较好；Kramer 和 Baron (1995) 编制的父母期望和儿童同胞关系感知问卷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Sibling Relationships Questionnaire, PEPC-SRQ)，问卷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温暖 (warmth)、冲突 (antagonism) 和竞争 (rivalry)，由父母填写，主要针对 14 个月至 8 岁儿童，在使用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会根据问卷维度或被试年龄对问卷进行调整，以适应自己的研究 (Yu, & Gamble, 2008)，该问卷整体信效度较好。

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为王文婷 (2014) 翻译的同胞关系问卷，用于测量儿童与其年龄差最小的同胞间的关系。该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同胞亲密、同胞冲突、同胞竞争和同胞权利对比，一共 48 道题。5 点计分，在计时分，冲突量表、支配量表和被支配量表的题目均采用反向计分。

2.3 学业自我效能感

2.3.1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2.3.1.1 个体因素

首先，个体的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上有显著差异。国内的研究表明，女高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普遍高于男高中生（沈俊娟，2016），但在国外的研究中，女大学生在学业上更有自信，自认为在学业上比男生表现的更好（Krejcová, Chýlová, & Michálek, 2019），也研究表明，性别因素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专业而异，文科专业中，女生的自我效能感高于男生，理科专业中，两者相差不明显（董艳等，2007）。

其次，个人的直接成功经验、替代经验、言语说服和情绪唤起都能影响自我效能感（Bandura, 1977），当学生为自己设定具体、可行的近期目标时，更能察觉到自己的进步，更易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Bandura, & Schunk, 1981）。除此之外，个体是否掌握正确的学习策略、学习方法和技能也能够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胡桂英等，2002）。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对学习策略的应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愿意尝试新的学习策略（Pintrich, & Groot, 1990; 单志艳, 2007）。

再次，个体的归因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也显著相关，积极归因的学生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消极归因的学生则表现出较低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张学民等，2001）。具体而言，如果学生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能力，则学业自我效能感最高；如果将失败归因于自身努力不足，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会明显下降；反之，如果将失败归因于运气不好等外部因素，学业自我效能感不会有较大的变化（Relich, Debus, & Walker, 1986）。

2.3.1.2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是个体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情感氛围、教养方式、父母婚姻关系等，它们都会对学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国内的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也越高；同时，独生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要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刘佳，2020）

研究显示，父母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反之亦然（陈玉珠，2013；沈俊娟，2016）。此外，父亲的情感温暖与大学生子女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而母亲的拒绝和过度保护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梁宇颂，2000）。

父母婚姻状况对儿童的自信心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有着直接影响。和谐的父母婚姻关系能够促进双方共同支持养育儿童，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学业自我效能感

(McHale, Rao, & Krasnow, 2000)。相反,父母婚姻冲突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与学业自我效能呈显著负相关,冲突越多,儿童的自卑感越强,学业自我效能感越低(宋鑫磊, 2019)。此外,父母婚姻冲突还会通过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来影响儿童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冲突越多,双方便越难以相互支持和教育孩子,导致儿童的自我评价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刘畅, 伍新春, 邹盛奇, 2016)。

2.3.1.3 学校因素

学校性质、地理位置和教师支持水平等因是影响个体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学校的性质不同会导致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性,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要显著高于私立学校学生,城镇学校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要高于农村学校学生(刘佳, 2020)。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相对于农村和私立学校的学生,享有更多教育资源。沈俊娟(2016)的研究表明,在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学业自我效能感呈递增变化,随着初中生年级的升高,学业自我效能感反而降低(刘佳, 2020),初中生除了生理成长带来的变化外,还面临升学压力和考试难度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研究表明,教师支持是学生获得的重要社会支持之一(Wentzel et al., 2010),能够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教师支持属于学生的外部支持范畴,它包括自主支持、认识支持和情绪支持三个方面。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反馈、鼓励、关注和关心,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Komaraju, 2013)。反之,教师的低关注度、低期望、疏远等行为会降低学生的自信心,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教师对学生支持程度的增加能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课堂参与度,让学生更自信、更勇敢地采用非逃避的策略解决问题(柴晓运等, 2011; 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05)。

2.3.2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Bandura 和 Schunk (1981) 研究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准确的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学生在学习上表现的越积极,越容易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一般也很低(Komaraju, & Nadler, 2013; MacPhee, Farr, & Canetto, 2013)。

有人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英语和数学课程的自我效能感测试,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表现呈正相关(Fast et al., 2010; Jiang, Song, Lee, & Bong, 2014)。这可能是因为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在遇到学业困难时,较少表现出焦虑情绪,能够更加积极、正确地解决问题(刘佳, 2020)。此外, Bassi 等人(2007)发现,自我效能感得分高的学生比自我效能感得分低的学生有更高的学业抱负,

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庭作业，并且在考试中表现出较少的焦虑情绪（陈顺森，叶桂青，2007）。

2.3.3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对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目前国外常使用的量表有：《学业自我效能问卷(ASEQ)》(Wood, & Locke; 1987);《控制、个体和手段—目的信念问卷(CAMI)》(Skinne, Chapman, & Baltes, 1988);《Morgan-Jinks 学生效能量表(MJSES)》(Jinks & Morgan, 1999)等等。国内的问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改编国外的问卷，另外一类是自编问卷。

本研究采用梁宇颂和周宗奎于 2000 年改编自 Pintrich 和 DeGroot(1990)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问卷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17，量表的总体信效度一致性较高，符合要求。

2.4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家庭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父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这在根本上会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Pajares, 1996）。父母长期的拒绝、惩罚等专制教养，不仅阻碍同胞关系的发展，导致亲密同胞关系减弱(Tippett, & Wolke, 2015)，也反向预测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陈玉珠，2013）。

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采用控制等专制教养对待同胞关系，不仅无助于提高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反过来还会导致同胞关系中更多的消极情绪（McHale, Rao, & Krasnow, 2000），在青少年的同胞冲突中，父母的专制控制与同胞冲突呈正相关（Chen, 2019）。接受权威教养的子女比接受专制教养的子女更以成功为导向，拥有更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Llorca, Cristina, & Malonda, 2017），在面临学业任务挑战时，他们更具有坚持不懈、独立和友好等特质，并且能够有效地处理任务（Llorca, Cristina, & Malonda, 2017）。父母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和过度干涉等行为，则容易让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温暖和接纳，产生逆反和自卑心理，进而对学习厌恶、抵触（俞国良，1999）。专制教养下的孩子缺乏以成功为导向的特质和坚持不懈、独立、友好等品质，从而在学业上缺乏自信（Baumrind, & Black, 1967）。同时，高要求又缺乏回应的专制父母，不会为孩子提供支持，也很少参与孩子学业（Llorca, Cristina, & Malonda, 2017）。研究表明，父母长期的拒绝和专制教养与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陈玉珠，2013；沈俊娟，2016），父母采用的专制教养越多，子女就越可能表现出包括孤独、冷漠、适应性差和自我效能感低下等特征（Maccoby, & Martin, 1983; Masud et al., 2016），这些都会影响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并且这个影响是深远的（Maccoby, & Martin, 1983）。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学者直接研究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但有研究发现，在有同胞的家庭中，头胎儿童通常在感知成功、效率、教育倾向及抱负方面具有主导地位，而头胎与二胎年龄间隔较大时，儿童往往有更好的学业自我效能感（Krejcová, Chýlová & Michálek, 2019），这与 Voyer 和 Voyer(2014)的元分析研究结果相符。另外，相较于男性同胞，女性同胞可能更容易感知强烈的学业自我效能感（Gutiérrez, 2017）。

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关于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仍然存在不足。首先，国内外对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初中以上的学生，他们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也更受关注。但是，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讲，童年中期也非常重要，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内外化问题往往会增加（Wolff, & Ollendick, 2006），学生也开始关注自己在学业上的表现。其次，在多子女家庭中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

（Krejcová, Chýlová & Michálek, 2019, Gutiérrez, 2017）和父母教养对其影响，没有涉及到同胞关系。再次，国外研究发现，亚裔学生对父母的专制教养评价较高，父母专制教养下的学生学业表现也较好（Chao, 1994），这与传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Llorca, Cristina, & Malonda, 2017）。因此，有必要考察在中国本土的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对小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不仅可以弥补研究的不足，丰富相关研究，还可以为父母的教养提供建议。

3 核心概念界定

3.1 父母专制教养

国外对教养方式的概念比较权威的界定来自于 Darling 和 Steinberg(1993), 他们将父母教养定义为, 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以及其对子女情感的一种组合 (牛燕洁, 2014)。国内对父母教养的定义, 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看, 是指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是一种稳定的行为倾向 (牛燕洁, 2014; 王丽等, 2005)。

美国心理学家 Baumrind (1971) 用家庭观察、实验室观察的研究方法, 将父母教养划分为权威教养、专制教养和宽容教养。权威教养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是一种温暖的、没有惩罚性的、与儿童和青少年适应性行为具有一致性的亲子互动模式 (Milevsky et al., 2007; Steinberg et al., 1994), 这种教养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温暖与理解相结合、控制与要求相结合。专制教养 (Authoritarian Style), 是一种低热情、又有着严苛纪律的教养模式, 这种模式容易让孩子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温暖。宽容教养 (Permissive Style), 指的是父母在教养中几乎不控制孩子的行为, 对孩子的行为缺少监督, 宽容教养型父母能够较大程度接受孩子的行为, 也不会设置太多的纪律 (Steinberg et al., 1992)。Maccoby 和 Martin (1983) 在 Baumrind 的基础上又添加了第四种养育方式, 被称为疏忽养育, 其特征是缺乏反应性和要求性, 甚至不会接纳或管教孩子 (Richaud et al., 2013)。在国内外的研究中, 一般都是将父母专制教养纳入父母教养的其中一个分类进行研究, 涉及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 一是考察父母专制教养的影响因素, 二是研究专制教养与儿童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综合以往研究, 本文将父母专制教养定义为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拒绝、敌意、惩罚、严厉、控制等教养行为。

3.2 同胞关系

关于同胞关系 (sibling relationship) 的概念界定, 目前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 Cicirelli 为代表的互动论, 另外一种是以 Brody 为代表的关系论。本研究将采用互动论的观点, 将同胞关系定义为在完整家庭中, 同胞之间通过身体、语言等多种方式交流和互动的一种关系。

3.3 学业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是班杜拉 (1994) 定义的经典概念, 它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实现既定目标和处理生活中各种需求的能力的看法 (Stajkovic, & Luthans, 1998, pp 66)。学业自我效能感 (academic self-efficacy) 是个人在教育维度上所表

现出来的自我效能(Pajares, 1996)。

在本研究中，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学习者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顺利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的主观判断和感受。

4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4.1 研究目的

(1) 考察多子女家庭中小学生的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现状。

(2) 考察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及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

(3) 考察同胞关系在父母专制教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4.2 研究思路

当前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子研究，第一是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状研究；第二是同胞关系是否会在父母专制教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研究。

具体的研究思路为：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以深入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其次，收集并分析与三者相关的问卷，并选取适用的问卷，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整理和修订。然后，在成都市两所小学的3-6年级学生中，在得到班主任同意的前提下，培训小学班主任，向其说明问卷调查的意义和方法，采取自愿填写的原则，由一名班主任和一名心理健康专业硕士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纸质问卷，并当场回收，测试时间为20到30分钟。最后，将数据整理，输入电脑，进行分析并得出研究结果，对结果进行讨论。

4.3 研究假设

根据前文分析，并结合以往研究，现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1) 父母专制教养、同胞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同胞的性别、年级、同胞年龄差、同胞性别组合上呈显著差异。

(2) 父母专制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同胞关系显著负正向预测小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3) 同胞关系在父母专制教养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5 研究方法

5.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成都市两所学校选取了小学 3 到 6 年级非独生子女的完整家庭，共发放 1100 份纸质问卷，最终回收了 1031 份，得到有效问卷共计 967 份。其中，男生 431 人（占 44.57%），女生 536 人（占 55.43%），学生年龄在 8 到 1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0.39 ± 1.21 岁，父亲平均年龄为 39.15 ± 5.89 岁，母亲平均年龄为 36.76 ± 5.55 岁。

5.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首先利用文献法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查找了包括但不限于“父母教养”、“同胞关系”、“同胞冲突”、“父母专制教养”、“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sibling relationship”、“parenting”、“authoritarian parenting”、“academic self-efficacy”等关键词，以及将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键词组合起来的相关文献，分析和整理相关文献，确定了以下研究工具。

5.2.1 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中，被试需要填写自身的姓名、性别、年龄、年级等个人信息以及父母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此外，被试还需要填写与自己年龄最近的另一名同胞的性别、年龄等信息。

5.2.2 父母专制教养问卷

本研究采用 Peixia Wu 等人于 2002 年修订的《教养方式与维度问卷 (The 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 PSDQ)》中的专制教养问卷来测量父母专制教养。该问卷适合中国文化环境 (Wu et al., 2002; 王明珠等, 2015)，问卷共有 11 道题，包括言语敌意 (verbal hostility, 如大声喊叫、争论等)、体罚 (physical coercion)、专断惩罚 (nonreasoning/punitive, 如没有解释的惩罚、没有正当理由的威胁等) 三个维度。问卷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从不 (never)，2 表示偶尔 (once in a while)，3 表示一半时间 (about half of the time)，4 表示经常 (very often)，5 表示总是 (always)。该问卷由儿童填写，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的专制教养程度越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4。

5.2.3 同胞关系问卷

本研究测量同胞关系所使用的量表是王文婷 (2014) 翻译的《同胞关系问卷》，这个量表用于测量儿童与其年龄差最小的同胞之间的关系。该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即同胞亲密、同胞冲突、同胞竞争和同胞权利对比，共 48 道题。其中，同胞亲密属于积极的同胞关系，而同胞冲突、权利对比和同胞竞争则属于消极的同胞关系。

问卷由儿童填写，采用 5 点计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2。

5.2.4 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本研究测量学业自我效能感所使用的问卷是由梁宇颂和周宗奎于 2000 年改编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问卷包含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共 22 道题，由儿童填写，采用 5 点计分。评分标准从 1 到 5，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的自我效能感越好。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7，信效度较高，使用广泛。

5.3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在获取纸质问卷之后，先对问卷进行检查，将未填、填写不完整的问卷进行剔除，然后在将数据录入电脑的过程中，将规律作答、乱答的问卷剔除；录入电脑之后，校对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处理，并使用 SPSS 21.0 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用 Mplus8.3 软件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6 研究结果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有效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 SPSS 软件中,将同胞关系、父母专制教养、学业自我效能感所有项目一起进行未旋转探索性因素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 1,结果发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8.09%,低于 40%的临界值,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6.1 父母专制教养的现状

对小学生的父母专制教养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父亲专制教养的平均值为 1.54,标准差是 0.62,母亲专制教养的平均值为 1.57,标准差是 0.62。由于本问卷采用的是 5 点计分,中数为 3,说明父母的专制教养程度比较低。

6.1.1 父母专制教养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为了考察 3-6 年级小学生的父母专制教养在性别上的差异性,以被试的性别为自变量,父母的专制教养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父母体罚($t=4.76, p<0.001$)、言语敌意($t=3.33, p=0.001$)、专断惩罚($t=2.01, p=0.045$)和专制教养平均分($t=3.77, p<0.001$)在小学生性别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父母专制教养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因变量	男 (M±SD) (N=431)	女 (M±SD) (N=536)	t	p
父母体罚	1.60±0.63	1.42±0.50	4.76***	<0.001
父母言语敌意	1.79±0.83	1.62±0.70	3.33**	0.001
父母专断惩罚	1.58±0.76	1.49±0.69	2.01*	0.045
父母专制教养平均分	1.66±0.65	1.51±0.54	3.77***	<0.001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6.1.2 父母专制教养在年级上的差异性

为了了解父母专制教养在年级上的差异情况,以年级为自变量,对父母专制教养在小学生年级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父母体罚($F=17.48, p<0.001$)、言语敌意($F=6.44, p<0.001$)、专断惩罚($F=6.88, p<0.001$)以及专制教养平均分($F=11.65, p<0.001$)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

表 2 父母专制教养在年级上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3 年级 (M±SD) (N=264)	4 年级 (M±SD) (N=313)	5 年级 (M±SD) (N=147)	6 年级 (M±SD) (N=243)	均方 (MS)	F	p
父母体罚	1.70±0.64	1.48±0.54	1.40±0.54	1.36±0.51	5.50	17.48***	<0.001
父母言语敌意	1.86±0.81	1.64±0.72	1.55±0.70	1.67±0.78	3.71	6.44***	<0.001
父母专断惩罚	1.70±0.78	1.48±0.66	1.42±0.69	1.49±0.73	3.55	6.88***	<0.001
父母专制教养平均分	1.75±0.64	1.53±0.55	1.46±0.58	1.51±0.57	4.01	11.65***	<0.001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结果如表 3 所示, 父母体罚、言语敌意、专断惩罚以及专制教养平均分在 3 年级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 4 至 6 年级。

表 3 父母专制教养在年级上的事后多重比较(LSD)

因变量	(I) 年级	(J) 年级	平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	p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体罚	3 年级	4 年级	0.22***	0.05	<0.001	0.11	0.30
		5 年级	0.30***	0.06	<0.001	0.12	0.31
		6 年级	0.34***	0.05	<0.001	0.12	0.36
父母言语敌意	3 年级	4 年级	0.22**	0.06	0.001	0.20	0.34
		5 年级	0.31***	0.08	<0.001	0.15	0.36
		6 年级	0.19**	0.07	0.005	0.16	0.32
父母专断惩罚	3 年级	4 年级	0.22***	0.06	<0.001	0.11	0.32
		5 年级	0.27***	0.07	<0.001	0.10	0.32
		6 年级	0.22**	0.06	0.001	0.08	0.35
父母专制教养平均分	3 年级	4 年级	0.22***	0.05	<0.001	0.12	0.30
		5 年级	0.30***	0.06	<0.001	0.16	0.41
		6 年级	0.24***	0.05	<0.001	0.12	0.35

6.1.3 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差异性

将被试按照同胞年龄差分为 4 组, 第 1 组同胞年龄差为 0-3 岁, 第 2 组同胞年龄差为 3-6 岁, 第 3 组同胞年龄差为 6-9 岁, 第 4 组同胞年龄差为 9 岁以上, 对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差异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父母体罚($F=2.57, p=0.053$)、言语敌意($F=1.84, p=0.137$)、父母专断惩罚($F=1.62, p=0.184$)和专制教养平均分($F=2.35, p=0.071$)在同胞年龄差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0-3 岁 (M±SD) (N=264)	3-6 岁 (M±SD) (N=313)	6-9 岁 (M±SD) (N=147)	9 岁以上 (M±SD) (N=243)	均方 (MS)	F	p
父母体罚	1.57±0.62	1.47±0.55	1.49±0.58	1.41±0.53	0.85	2.57	0.053
父母言语敌意	1.78±0.83	1.64±0.71	1.67±0.73	1.67±0.83	1.08	1.84	0.137
父母专断惩罚	1.60±0.81	1.53±0.71	1.48±0.67	1.46±0.70	0.85	1.62	0.184
父母专制教养平均分	1.65±0.65	1.55±0.52	1.55±0.56	1.52±0.57	0.83	2.35	0.071

6.1.4 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差异性

根据同胞的年龄和性别，将同胞性别组合分为兄弟、姐弟、姐妹和兄妹四种组合，对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差异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分析如表 5 所示，父母言语敌意($F=5.46, p=0.001$)、专断惩罚($F=4.61, p=0.003$)、专制教养平均分($F=4.99, p=0.002$) 在同胞性别组合上存在显著差异，父母体罚($F=2.51, p=0.058$) 在同胞性别组合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5 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兄弟 (M±SD) (N=213)	姐弟 (M±SD) (N=245)	姐妹 (M±SD) (N=275)	兄妹 (M±SD) (N=234)	均方 (MS)	F	p
父母体罚	1.61±0.64	1.47±0.53	1.42±0.49	1.51±0.63	1.506	2.51	0.058
父母言语敌意	1.87±0.89	1.70±0.76	1.61±0.66	1.63±0.74	3.154	5.46**	0.001
父母专断惩罚	1.65±0.84	1.48±0.63	1.50±0.72	1.51±0.70	1.311	4.61**	0.003
父母专制教养平均分	1.71±0.69	1.55±0.54	1.51±0.53	1.55±0.60	1.754	4.99**	0.002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如表 6 所示，父母言语敌意、父母专断惩罚和专制教养平均分在兄弟组合的得分显著高于姐弟组合、姐妹组合和兄妹组合的得分；父母体罚在兄弟组合的得分显著高于姐弟组合、姐妹组合。

表 6 父母专制教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事后多重比较

因变量	(I) 同胞 性别组合	(J) 同胞 性别组合	平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	p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父母体罚	兄弟	姐弟	0.14**	0.05	0.008	0.12	0.31
		姐妹	0.19***	0.05	<0.001	0.11	0.41
		兄妹	0.11	0.05	0.056	-0.23	0.43
父母言语敌意	兄弟	姐弟	0.17*	0.07	0.15	0.34	0.91
		姐妹	0.26***	0.07	<0.001	0.15	0.46
		兄妹	0.24***	0.07	0.001	0.06	0.32
父母专断惩罚	兄弟	姐弟	0.17**	0.07	0.012	0.10	0.33
		姐妹	0.15*	0.07	0.032	0.13	0.42
		兄妹	0.14*	0.07	0.041	0.08	0.33
父母专制教养平均分	兄弟	姐弟	0.15**	0.06	0.004	0.12	0.31
		姐妹	0.20***	0.05	<0.001	0.18	0.41
		兄妹	0.16**	0.06	0.004	0.14	0.35

6.2 同胞关系的现状

对同胞关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小学生的同胞关系平均值为 2.79，标准差为 0.45，其中同胞亲密为 3.17，标准差为 0.78，同胞竞争为 2.37，标准差为 0.73，同胞冲突为 1.97，标准差为 0.80，同胞权利对比为 2.65，标准差为 0.65，由于本问卷采用的是 5 点计分，中数为 3，说明同胞关系质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6.2.1 同胞关系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同胞关系在性别上的差异性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同胞亲密($t=-3.96$, $p<0.001$)和同胞关系平均分($t=-1.98$, $p=0.048$)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同胞竞争($t=1.32$, $p=0.189$)、同胞冲突($t=0.34$, $p=0.187$)和同胞权利对比($t=-1.28$, $p=0.202$)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同胞关系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因变量	男 (M±SD) (N=431)	女 (M±SD) (N=536)	t	p
同胞亲密	3.06±0.76	3.26±0.80	-3.96***	<0.001
同胞竞争	2.41±0.72	2.34±0.74	1.32	0.189
同胞冲突	1.98±0.89	1.96±0.92	0.34	0.187
同胞权利对比	2.62±0.66	2.68±0.64	-1.28	0.202
同胞关系平均分	2.76±0.43	2.82±0.47	-1.98*	0.048

6.2.2 同胞关系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同胞关系在年级上的差异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同胞亲密($F=5.22$, $p<0.001$)、同胞竞争($F=4.17$, $p=0.006$)、同胞冲突($F=8.31$, $p<0.001$)、同胞权利对比($F=8.01$, $p<0.001$)、同胞关系平均分($F=8.94$, $p<0.001$)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8 同胞关系在年级上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3 年级 (M±SD) (N=264)	4 年级 (M±SD) (N=313)	5 年级 (M±SD) (N=147)	6 年级 (M±SD) (N=243)	均方 (MS)	F	p
同胞亲密	3.09±0.69	3.16±0.78	3.40±0.79	3.13±0.88	3.27	5.22***	<0.001
同胞竞争	2.49±0.77	2.29±0.71	2.39±0.67	2.33±0.74	2.21	4.17**	0.006
同胞冲突	2.19±0.86	1.84±0.87	1.85±0.82	1.97±0.90	6.64	8.31***	<0.001
同胞权利对比	2.66±0.66	2.71±0.63	2.82±0.65	2.70±0.68	3.34	8.01***	<0.001
同胞关系平均分	2.69±0.42	2.87±0.43	2.83±0.42	2.78±0.50	1.78	8.94***	<0.001

对数据进行事后比较如表 9 所示, 5 年级学生在同胞亲密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其它三个年级; 3 年级学生在同胞竞争的得分上显著高于 4 年级和 6 年级的学生, 在同胞冲突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其它三个年级; 而在同胞权利对比的得分上, 4 年级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余三个年级, 同胞关系平均分上, 3 年级的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余三个年级。

表 9 同胞关系在年级上的事后多重比较

因变量	(I)年级	(J) 年级	平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	<i>p</i>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同胞亲密	5 年级	3 年级	0.31***	0.08	<0.001	0.15	0.46
		4 年级	0.25**	0.08	0.002	0.09	0.40
		6 年级	0.26**	0.08	0.001	0.10	0.43
同胞竞争	3 年级	4 年级	0.21***	0.06	0.001	0.08	0.32
		5 年级	0.11	0.07	0.161	-0.04	0.24
		6 年级	0.16*	0.06	0.012	0.04	0.29
同胞冲突	3 年级	4 年级	0.35***	0.75	<0.001	0.20	0.49
		5 年级	0.34***	0.92	<0.001	0.16	0.52
		6 年级	0.22**	0.80	0.006	0.16	0.37
同胞权利对比	4 年级	3 年级	-0.13*	0.05	0.013	-0.24	-0.03
		5 年级	-0.30***	0.06	<0.001	-0.42	-0.17
		6 年级	-0.18**	0.06	0.001	-0.27	-0.07
同胞关系总分	3 年级	4 年级	-0.19***	0.04	<0.001	-0.26	-0.11
		5 年级	-0.15**	0.05	0.001	-0.58	-0.14
		6 年级	-0.10*	0.04	0.018	-0.17	-0.02

6.2.3 同胞关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差异性检验

将被试按照同胞年龄差分为 4 组。第 1 组同胞年龄差为 0-3 岁，第 2 组同胞年龄差为 3-6 岁，第 3 组同胞年龄差为 6-9 岁，第 4 组同胞年龄差为 9 岁以上。对小学生的同胞关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10 所示，同胞竞争($F=4.19$, $p=0.006$)、同胞冲突($F=14.13$, $p<0.001$)和同胞关系平均分($F=7.86$, $p<0.001$)在同胞年龄差上存在显著差异，同胞亲密($F=0.20$, $p=0.896$)和同胞权利对比($F=2.08$, $p=0.101$)在同胞年龄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0 同胞关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0-3 岁	3-6 岁	6-9 岁	9 岁以上	均方 (MS)	<i>F</i>	<i>p</i>
	(M±SD) (N=272)	(M±SD) (N=356)	(M±SD) (N=219)	(M±SD) (N=120)			
同胞亲密	3.17±0.77	3.20±0.79	3.18±0.77	3.19±0.90	0.13	0.20	0.896
同胞竞争	2.49±0.71	2.31±0.71	2.37±0.76	2.25±0.76	2.22	4.19**	0.006
同胞冲突	2.37±0.73	2.05±0.89	1.77±0.82	1.65±0.95	11.10	14.13***	<0.001
同胞权利对比	2.72±0.61	2.64±0.67	2.58±0.67	2.68±0.64	0.88	2.08	0.101
同胞关系平均分	2.70±0.40	2.79±0.45	2.89±0.44	2.79±0.50	1.57	7.86***	<0.001

对数据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如表 11 所示，同胞年龄差为 0-3 岁阶段的被试在同胞竞争的得分上显著高于 3-6 岁和 9 岁以上年龄差的同胞，在同胞冲突的得分上显著高于 6-9 岁和 9 岁以上年龄差的同胞；0-3 岁阶段的被试在同胞关系平均分上显著低于其他三组。

表 11 同胞关系在同胞年龄差上的事后多重比较

因变量	(I)年级	(J) 年级	平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	<i>p</i>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同胞竞争	0-3 岁	3-6 岁	0.18**	0.06	0.003	0.06	0.29
		6-9 岁	0.12	0.07	0.072	-0.01	0.25
		9 岁以上	0.24**	0.08	0.003	0.08	0.40
同胞冲突	0-3 岁	3-6 岁	0.13	0.06	0.077	-0.14	0.27
		6-9 岁	0.40***	0.07	<0.001	0.26	0.56
		9 岁以上	0.51***	0.06	<0.001	0.32	0.70
同胞关系总分	0-3 岁	3-6 岁	-0.10**	0.07	0.005	-0.19	-0.07
		6-9 岁	-0.16***	0.09	<0.001	-0.24	-0.08
		9 岁以上	-0.20***	0.08	<0.001	-0.30	-0.11

6.2.4 同胞关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差异性检验

根据同胞的年龄和性别，将同胞性别组合分为兄弟组合、姐弟组合、姐妹组合和兄妹组合，对同胞关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差异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12 所示，同胞亲密($F=11.36$, $p<0.001$)在同胞性别组合上存在显著差异，同胞竞争($F=1.29$, $p=0.277$)、同胞冲突($F=1.73$, $p=0.160$)、同胞权利对比($F=1.83$, $p=0.139$)和同胞关系平均分($F=2.38$, $p=0.068$)在同胞性别组合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2 同胞关系在同胞性别组合上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兄弟 (M±SD) (N=213)	姐弟 (M±SD) (N=245)	姐妹 (M±SD) (N=275)	兄妹 (M±SD) (N=234)	均方 (MS)	<i>F</i>	<i>p</i>
同胞亲密	2.97±0.79	3.20±0.77	3.37±0.74	3.09±0.83	6.97	11.36***	<0.001
同胞竞争	2.39±0.72	2.41±0.72	2.30±0.75	2.40±0.73	0.69	1.29	0.277
同胞冲突	2.07±0.94	1.93±0.86	2.00±0.93	1.89±0.87	1.41	1.73	0.160
同胞权利对比	2.59±0.63	2.69±0.67	2.70±0.63	2.61±0.69	0.78	1.83	0.139
同胞关系平均分	2.73±0.45	2.79±0.44	2.84±0.48	2.80±0.43	0.48	2.38	0.068

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如表 13 所示，姐妹组合在同胞亲密的得分显著高于兄妹组合、姐弟组合和兄弟组合得分；在同胞冲突上，兄弟组合显著高于兄妹组合；在同胞权利对比上，姐妹组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兄弟组合的得分；在同胞关系平均分上，姊妹组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兄弟组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36021022033010101>